

历史文苑

上册

喀什噶尔

Kashgar

王时样◎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历史文化

上册

喀什噶尔

王时祥◎著

前言



喀什,是维吾尔语“喀什噶尔”的汉语简称。夏、商之际,喀什就以盛产昆仑玉而成为“玉石之路”的发源地,汉代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就是为了输入昆仑玉而专设的接纳站。据此,“玉石集中的地方”就是“喀什噶尔”这一地名最确切的含义。“喀什”之简称始于民国初年的汉文官方文书,“喀什噶尔”之称则发端于唐末宋初;比这更早的先秦时期,这里已被称为“疏勒”,是古代西域(新疆)36国中最早的“城郭诸国”之一;距今3000年左右,这里已进入农耕文化阶段;距今2500年前后,疏勒国就以经商致富而闻名遐迩。

喀什,还是今天以喀什市为中心的一个地区的统称,现辖喀什市与疏勒、疏附、伽师、岳普湖、英吉沙、巴楚、莎车、泽普、麦盖提、叶城等县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是全中国最西端的一个行政区。总面积16.2万平方公里的喀什地区,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西南是巍峨险峻的喀喇昆仑山脉;这两大山系既是喀什地区的西、南边缘,也是中国连接中、南亚的西部国界。在长达888公里的边界线上,数百个山口中至少有数十条通道联结着中国以外的古代世界;时至今日“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缘交通优势,不仅为中国所独有,也为世界所瞩目。自古至今,生活在喀什的各族人民,在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同时,还肩负着沟通对外交流与捍卫祖国西大门的重任。喀什是中国西部的最西部,也是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最前沿。研究古代的中西交往史,不能不知道西域(新疆),尤其不能不知道喀什(疏勒),这已是中外文化学术界的一个共识。

就其本质而言,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发展史。而文明则是人类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是在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及特质人文精神互相渗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综合体。文化



作为人类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不仅构成文明的具体内涵,同时又为人类特定文明的形成提供绵延不绝、鲜活丰富的动力。文化是动态的历史范畴,是一个过程,而文明则是各历史阶段的文化凝聚而成的结果与归宿。文化不仅具有阶段性,而且也具有区域性和其他多样性,从而构成一种在更大范围内相对稳固的文明形态。了解历史,将从研究文化开始。文化的内容涵盖了一定历史阶段中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成果。经济作为最基本的因素,决定着文化与文化人生存的条件。世界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及传统,由此催生了多姿多彩的不同文明。

多样性是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多样才显现出差异,差异才产生交往的需求,而交往则促进文化发展。文化具有“天下为公”的属性。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只要一旦生成,便会不分种族、不限国界、不择远近地迅速向外扩散,实现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历来是多样性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因,这也是人类之所以能与时俱进,使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不仅对自身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进而能谋取更多精神与物质财富的最重要原因。所以,从世界范围的人类发展历史看,凡是得到充分发展机遇并展示出充分发展结果的人类文明或文化,一般都是多个文化或文明(特别是与异质文化与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

当新石器时期的曙光普照华夏大地之际,具有仰韶文化特质的新石器文化已经在喀什大地上生根发芽,昭示着中华文明圈的西缘在这里成型。当3000多年前的西周穆王不远万里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登上帕米尔高原时,世界便开始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时代:从这时起,华夏民族的博大胸怀向世界敞开,借助一个上古帝王的双眼,在“世界屋脊”上把华夏文明的视线一直投向太阳落下的地方。



数百年后,沿着那条视线指示的方向,就有了亚欧大陆间那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经济、文化和各民族思想交流的一条人类历史大动脉。在海路大举开通之前,丝路东起中国,穿越中、南、西亚,将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与欧洲的希腊—罗马文明这四个文明圈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全球一体化的梦想从那时起就已经宣告开始。在这条路的起点上,由中国发明和生产的丝绸具有原创的标志性意义。这也正是19世纪时国际学术界把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的根本原因。最早记录丝路的是公元前4世纪时的拉丁作家克泰夏斯;而“丝绸之路”这一最早的提法,则是普鲁士舆地学和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年),他曾以五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享誉国际学术界。这无疑是对中华文明的极力推崇,也是对世界文明的积极促进者——中国的最高褒奖。

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丝路研究专家布尔努瓦夫人正确地指出:“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欧亚大陆,也涉及到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以中华文明为源头开辟的丝绸之路,在不长的时间里,丝绸的贩运已降到次要地位,“丝绸”只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种形象代名词存入历史的记忆;再到后来,甚至连经济交流也已经无法全面涵盖丝绸之路的实质,文化乃至人文思想的交流已上升到显要的地位;特别是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往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互补的重要载体之后,摒弃军事武力而纯以友好往来以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交流方式,迅速为古代四大文明普遍认可与接受,并为获得更多更新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而欣喜满足。世界由此而进步,中国由此而树立了美好形象。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而人类历史发展



也正是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融会从而创新的过程；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概括的那样，“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对话”，正是从古至今文化交流的精神升华与形象描述。

三

事实上，丝绸之路应该是中西之间一张网状交通线路的统称，它所指示的只是东西之间的互动方向而已，究竟有多少条线路以及道里路程，那是根本无法精确统计的。单从我国中原到地中海东岸，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就已经超过8000公里，因而古代的中西方之间绝少有直接往来者；中国与西方货物大都是沿途各国逐站转运的。当丝绸风靡古罗马从而造成罗马金银大量外流时，这种织物的产地及其生产工艺尚不为罗马人所知。出于丝绸垄断的需要，西亚的波斯人在自身也不甚了解的状况下有意无意地隐瞒了真相，以致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在其《田园诗》中写道：“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绒毛”。但共同的是，他们都认定丝绸的原产地是一个叫“赛里斯”的地方，致使近代的研究者们认为“赛里斯”所指的就是中国和丝绸。

丝绸原产地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但古代西方人最初所见到的丝绸并不是直接采购于中国内地，而是来自丝路的丝绸转运站；无论是从中华文明圈西界的地理环境而言，还是从语音最接近的角度去考证，这个为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赛里斯”，其实就是指中国，早在1947年，中国学者陈澄之就在《旅行杂志》上撰文指出：“自古以来，（喀什）这里便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大国际市场，此市场的发达，比中国东部的若干沿海港市要早得多！希腊人远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就到了中国的西境，称中国为Seres；后来罗马人称中国为Serica。同时希腊商人也的确曾到过绢国之都Sera。”

早在我国春秋时期，疏勒人用玉石和其他地产品到中原换回

了丝绸等商品，再组成大规模商队前往地中海沿岸，与占据南欧与北非的希腊人做生意，西方商品由此被商队带了回来，用作继续交换中原商品的商品。从疏勒——赛里斯人在古代国际商业上发挥中介角色开始，西方人首次感受到华夏文明，而中原人也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我国东汉之前将丝绸之路中国段西端的汇聚点以及西方人进入中国的第一大站确指为疏勒（喀什），其重要意义正在于此。正如陈澄之先生所言：“根据古籍的记载，希腊商人在古代多半云集在此，等待中国内地商人来到喀什跟他们交换商品；后来的阿拉伯商队，也是汇集聚散在这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贩运中国的丝绸到西方去。”

2100多年前张骞到西域时，发现“有市列”（即商贸市场）的疏勒城，在这之后，疏勒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才开始引起我国官方的正式注意，也成为此后历朝历代官方典籍重点记述的对象。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方重镇，疏勒有着当时西域组建最早的商队，同时也为丝路交通和商贸活动提供精良的设施装备和最佳服务。如果把丝路沿线上的所有重镇都比作粒粒明珠，那么喀什就是这串珠链上一颗充满梦幻色彩而又最漂亮诱人的祖母绿。

四

因华夏文明而孕育，凭西域文化而勃兴，借丝绸之路而壮大，靠自强不息而延续，这就是喀什形象的历史写照。以一个弧形的大圈使喀什的西南两面得以屏护的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其雄浑伟岸的躯体无论在任何维度上，都具有使这里的生灵充满传奇与诗意的潜质。周穆王的精灵在苍冥中向世界传递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奉献、吸纳的无尽信息。世世代代的喀什儿女忠实履行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为周穆王在帕米尔高原上点燃的文明篝火无休无止地续薪添柴；以薪火相传为事业，以畅通交流为己任，

把丝绸之路之上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打造的有声有色、光彩四溢。当喀什属于丝绸之路的那一刻开始，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流融会就通过喀什的眼睛聚焦并折射。喀什不能不成为考察和研究丝绸之路的一个最佳视点。

诗人周涛曾经说：“喀什是不可解的。你可以看透乌鲁木齐可怜的五脏六腑，但你看不透喀什那双迷蒙的双眼。喀什有一种更深厚的东西，一种更典雅、更高贵、更悠久的东西，那种东西不能确指，却时时处处存在着，弥漫着，让你感觉着，仿佛渗透在空气里。”富有诗意也颇具深意，诗人语言的艺术魅力已经让这段话成为经典。但深厚、典雅、高贵、悠久的喀什的那双眼睛，似乎也因此被涂上一层艺术的朦胧色彩而显得愈发迷蒙和加倍神秘。透过这双深邃的双眼，穿越时空隧道以探寻历史真相，正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喀什这块神奇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和传奇。陆地丝绸之路的兴起、壮大、衰微和振兴，都被喀什的双眼真切目睹；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的更替交叉、消长嬗变，也被喀什的双眼摄取留影；上下数千年无数部族和游人迁徙聚散的身影，至今仍在喀什的双眼中飘忽闪烁；任凭风云变幻却为中华民族的壮大与中国领土的完整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也为喀什的双眼所亲自见证；自身进步与延续的数千年辉煌历史文化，对喀什来说更是历历在目。凡是西域（新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喀什的双眼几乎都看到过。正是因为如此，还可以进一步说，喀什是古代中国看西方世界的眼睛，也是古代西方看中国的眼睛。如此深厚、典雅、高贵与悠久的双眼，要能一下看透的确不容易。因此，了解和研究喀什，要以中国为依托，以西域为基点，以中、南、西亚为参照，以丝绸之路所能涉及的世界范围为背景。所以，完整地解读喀什，是需要有耐心的。

联结中原与西方的我国西域，在自身厚重的文化底色上，被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轮番逐层或杂糅并施地抹上了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文化油彩，不细细剥离探究，谁也无法就某一线条或某一塗



层的文化特质作出准确判断。而喀什则是这块涂色板西缘杂色纷呈、凝缩到化不开的那一片色块。

如果说宋日之前,西域的龟兹、于阗、高昌、楼兰等等城郭之国还曾与喀什(疏勒)群雄并列、难分高下;到宋代以降,龟兹、于阗、楼兰、高昌等西域巨星,随着佛教文化的相继终结而在历史的天空中或暗淡褪色或陨落消失,但喀什却拾级而上,如日中天,开创了西域历史的新纪元,成为西域新质文化的代表与主导。从喀喇汗王朝到察合台汗国,喀什在西域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无可替代;叶尔羌汗国时期,喀什人曾经为西域史书写了最重要也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清代天山以南八大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枢设在喀什,应当说是大清王朝最睿智的决策。历史总是选择强者,而强者也将推动历史。地缘上的先天优势与自身的聪明才智被喀什人发挥到极致,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奉献、吸纳的气度通过喀什而演绎得尤为透彻;喀什人自强不息、敢为西域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在不断塑造崭新自我的同时,也使整个西域为之折服。可以说,喀什在西域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还可以说,喀什也是3000年来西域历史进程的最权威见证。

五

在喀什的历史上,操汉藏语系的我国西戎中的诸羌之族曾建立过疏勒、蒲犁、依耐、子合、西夜、朱居波等城郭之国,而汉族移民也曾在这里建立过“琴(秦)国”;至于清代的徕宁、恢武、嘉义、辑远等被称为“汉城”的名城,都曾在历史上举足轻重;唐代以后的百余年间,这里也是吐蕃人生息繁衍、筑城建堡的地方。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塞人、粟特人,先后创建了莎车、乌铄、碣石(伽师)、渠沙(佉沙)、桢中(柘枝)、石头城等城邦小国;其中由安息(帕提亚)移民所建的盘橐城在东汉的西域史上最为著名;而西域本土操吐火



罗语的焉耆与尉犁人不甘落后，也先后在这里建立过乌即与榆令二城。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的回鹘人与突厥语诸部族为喀什噶尔历史文化地位的确立曾有着划时代的功绩；此外，蒙古、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在喀什历史上也有过不同凡响的表现。喀什以自身的努力为丝绸之路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强烈地吸引了我国中原、西域乃至中、南、西亚各地先民在喀什这块土地上共同参与对丝绸之路的开发与建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奇特而又有趣的文化现象。

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形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并非总是从冲突开始。即使是文化碰撞也不意味着文化冲突。虽然冲突具有破坏性，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冲突总是短暂的。不同文明间和平的跨文化交往与最终的和谐融合，才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主流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而人类的历史发展正是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融会从而创新的一个过程。喀什的历史文化，为形态各异的不同文化相互吸纳、有机融合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上古时期直至东汉初期，我国的西北游牧民族为喀什本地确立了原始自然崇拜和巫教（萨满教），多神教的形态正与当时较低的认知能力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从西汉晚期开始，喀什成为佛教传入西域乃至中原最早的地区之一；东汉中期由于地方统治者倡导推行而被当地百姓普遍接受，使佛教成为一个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这一传统，使喀什长期保留着以小乘佛教为主流，以三仙洞、莫尔佛塔为代表的犍陀罗原始佛教文化，虽然在此后的西域大乘佛教之林中显得有点儿另类，却也独树一帜风味迥异。在佛教流传的同时，由建筑了盘橐城而闻名的安息移民又于西汉末年首先将祆教（拜火教）带进了喀什，此后又将其传播到整个西域；不久又引得摩尼教竞相效法，与佛教、祆教同存共荣。基督教（景教，即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也不甘人后，宋元之际已通过喀什向西域传

播；直到清末民初，喀什再度成为瑞典传教团在整个新疆传播基督教的基地。历史上，祆教、摩尼教与基督教虽然从未跻身西域的主流宗教地位，但却也从不轻言放弃，因为喀什习惯于开放与包容，总是带着谜一般的宽和微笑敞开自己的怀抱。

在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作为中华文明代表的中原文化，是传入西域最早也是最持久的文化形态，儒学与道教都在这里产生过一定影响，汉化的佛教进入成熟期后又曾返回来影响了西域传统的佛教。西域在属于丝绸之路的同时就已经是创造中华文明的一支有生力量。中原是丝路之母，西域则是丝路的培育者与守望者。西域在中华文明的哺育下又不断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多种养分的交互作用使西域固有的文化土壤显得更加深厚充实，中华文明因此而变得愈发多姿多彩、博大丰盈。作为伊斯兰教自陆路东传中国的第一站，喀什为中华文明增添新质元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伊斯兰教在西域最终取代佛教及其他各种宗教形态，以及使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有机融合的过程，最能体现喀什实现文化创意的能力与坚韧不拔的气魄。从此，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因此，20世纪初的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就曾敏锐地指出：“喀什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地区，对于研究历史以及国际政治具有重要意义。”（《中亚探险》）

六

具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心理特征并共同生活在西域（新疆）的现代维吾尔族，形成于16世纪。公元9世纪或更早些时候由我国漠北草原迁入西域的回鹘（回纥）人，是形成维吾尔族的族源之一，但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代的维吾尔族。在回鹘人迁入之前，距今六七千年前就生活在西域的原始土著部族，以及后来陆续迁入的羌、塞、匈奴、突厥、吐蕃、样磨、葛逻禄，都在数



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交流融洽,成为维吾尔族的族源。回鹘人定居西域之后,陆续西迁的契丹、蒙古等民族,也同样为维吾尔族的形成输入了自己的血液。而回鹘人同时又是我国裕固、撒拉(黄头回鹘)等族的族源之一。海纳百川、活力强劲才能使一个民族充满动力、蓬勃发展。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维吾尔族,有理由为此自豪。

新疆近现代意义上维吾尔族,从喀喇汗王朝时期勃然兴起,在察合台汗国时期发展壮大,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全面形成,前后历经800余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喀什是近现代维吾尔文化的奠基者,是助产士,是摇篮,是领军的旗帜,也是历经千年磨难而无怨无悔的精神守望者。

如同现代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而形成,现代维吾尔语则是从喀喇汗王朝时期的“哈喀尼亚语”——喀什噶尔语脱胎而成的。经过五六百年的大力推广,喀什噶尔语已成为察合台汗国所统辖的广大地域间各民族间最规范通用的社会交际语。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喀什噶尔语被定为西域地区官方及民众的通用语。时至今日,研究维吾尔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喀什噶尔语依旧是主要的出发点。此外,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在西域使用阿拉伯文字并广泛推行人名的阿拉伯化,毫无疑问也是发端于喀什。

10世纪初期,以喀什为基地首创的“买德力斯”——经文学校,甚至对中亚各民族的古典教育模式也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经文学校不只是传播宗教知识的场所,在伊斯兰教传入喀什的初期,早期的清真寺只是学校的附属建筑。包括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内,曾经在中古时期对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阿拉伯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中、南亚一带的文史哲等,特别是西域各民族千百年间所积累的语言、文字、史地、文学、音乐、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也是学校教授的主要内容。历经数百年,这种以“买德力斯”为名义的文化教育模式,终于从喀什传遍西域(新疆),为

各地穆斯林普遍接受。正因为如此,西域乃至中亚藏书最多的大型图书馆以及规模宏大的星相天文台才最早出现在喀什,许多在中、西亚已成名的文人学者慕名来访。

历史上的西域,曾有过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游牧时期的突厥人、回鹘人等也有过很长时期的民间口头文学;但以阿拉伯——波斯文化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维吾尔作家文学,同样是从古代的喀什最先起步。自11世纪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喀什为此奠基后,维吾尔作家文学便开始步入一条快速发展轨道。喀喇汗王朝时期,以喀什为文化中心的回鹘文学魅力四射;察合台汗国时期,大力开创“文学的喀什噶尔时代”,是西域乃至中亚文坛的骄傲;因叶尔羌汗国的大力促进,维吾尔史学、哲学以及翻译文学也相继异军突起、争芳斗艳;富于批判精神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维吾尔文学由此在近代走向成熟。正是喀什文坛的独领风骚,维吾尔文学才有了历史上的百花齐放。

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歌舞艺术,是文化范畴内最富有活力与表现力的一种形式,比一般的文化形式更容易产生教化与美育上的实质作用;它能以一种活生生的感知形象及独有的通感方式,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悠然进入一种奇妙的精神境界,从而在意识的层面上自然地产生一种为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心理需求。早在汉唐时期,与西域龟兹乐、于阗乐、高昌乐并列的疏勒乐就已经蜚声四海轰动中原,对我国的音乐歌舞艺术产生过非常积极的影响。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当西域其他的地方都已风光不再时,叶尔羌汗国继汉唐西域歌舞之余韵,旁及中、南、西亚音乐艺术之精华,在广泛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组编出流传至今的“十二木卡姆”。在此前后已改编定型的喀什刀郎歌舞更以其原生态的特质独树一帜、奇葩怒放。今天的新疆被世人称为“歌舞之乡”,喀什在其中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喀什在西域历史文化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准确地说,



以伊斯兰教为外在形式的阿拉伯——波斯文化的传入，并将其成功地嫁接在由中华文明滋润下成长的西域文化之树上，喀什文化则是此后这棵树上最早结出的那枚硕果。这种新质文化的渗透力，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民情风俗在喀什率先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从饮食、服饰到礼仪、节庆，从商业货币到文化艺术，乃至建筑艺术和手工业等等，可以说，从经济活动到意识形态，无处不呈现出这种变化的印记。其结果完善并丰富了自身，也影响和引导了整个西域。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使新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民俗风情极有特色、最具魅力的地方之一，就像一窖风味独特的美酒；而喀什则是其中一桶精华凝缩、浓香悠长的千年陈酿。“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这句众口相传的断语，在更为深广丰厚的价值与内涵之中，最具特色的维吾尔民俗风情应当说是其中最直观、最诱人的部分。维吾尔族的民俗风情至今已不能算是喀什的专利，别样的风味乃至更美的人文景致在新疆各地都不乏其例。但喀什仍然以其典型、浓郁的特征在为人们提示这里曾经是维吾尔民俗文化的源头。

从新疆石器时代文化到自然崇拜时期的历史遗迹，从佛教文化的兴衰到祆教、摩尼教与景教的争相介入，还有数不清的古城兴废与遗址更替，构成了我们至今可见的汉唐时期西域历史的画卷。而喀什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保留了更多原生态的文物古迹，以及许多至今仍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着的古城区和建筑，颇具典型性的民居、清真寺、麻扎（陵墓）、器物等活文物，对西域历史文化完整而更深入的研究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文物是历史文明的见证，也是历史文化的形象诠释。因历史的偏爱而为喀什慷慨赠与的众多文化瑰宝，其绝对价值是无法用常数来计算的。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清晰检索出当地历史发展的曲折轨迹，清晰看到喀什人文沃土上工艺制造的绝对水平；而作为一种历史精神和人文理念的体现，这些文物成为人们解读喀什、新疆乃至中国文化弥足珍贵的史料。

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大地有着令所有人无比神往的自然风光,但同时集沙漠、戈壁、绿洲、雪山、森林、草场、峡谷、河流以及世界高峰、高原湖泊、丰富矿藏和众多口岸于一域的地方,全疆乃至全国也只有喀什一处。尽管它只有新疆地域的十分之一,但正是这十分之一最能概括和表达新疆。无论多美的自然风光,如果缺乏历史文化的观照和诠释,它也只能是一处景致而已,想要让人们的记忆永久存盘恐怕很难。丝绸之路选择了喀什,中西文化交流钟情于喀什,而各族人民则创造和丰富了喀什,使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之中处处弥散着历史和文化的芬芳余韵,受到古今中外各国游客的关注青睐那叫理所当然。为此,被人们着力渲染的“喀什噶尔情结”,早已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于是,学者杨镰十分动情地说:“喀什噶尔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它深奥难懂,又朴素无华;它冷峻刻板,又海纳百川。几乎所有的西域探险家都品味过它的温馨,它的古朴,它的多变和它的不变;都有过伴随终生的喀什噶尔情结;都在自己的书中为喀什噶尔辟置了专门的章节。可以肯定,没有喀什噶尔,西域探险史就完全是另一个结构了。”(《发现西部》)所以橘瑞超才会说:“这里是中亚地区政治、商业的中心,自古以来就为世人所知,至今到中亚旅行的人,没有不介绍喀什的。”16世纪的维吾尔族史学家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还说:“人们从喀什噶尔搬到其他地方之后,总感到心里不像那样踏实,老是惦念这里。这是(对喀什噶尔)最高的赞赏。”喀什自身丰厚的历史文化不妨先放下,仅仅是解读本地人特别是外地人的这种“喀什噶尔情结”,就将使喀什噶尔这本“读不完的书”无休止地增页加码,越发地读不完了。

中外人士这种“喀什噶尔情结”得以确立,喀什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人民的爽朗质朴、热情好客当然也是重要理由。据《拉失德史》记载:“喀什噶尔地区习惯上不贩卖水果,也不禁止任何人采摘。而且果树一般都种植在路旁,大家可以随意采摘”;同时还特别



强调,“这儿是贫而快乐与富而不贪的人的世外桃源”。直到19世纪还有人说:喀什“是亚洲从北向南、从东到西、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各种各样人物的集合地,多么的奇妙”,“(喀什)许多人在游历四方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个个都变成了能说会道的演说家。他们由于接触的人多,行为举止一般都比较得体大方,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杨哈斯本《帕米尔历险记》)还有许多西方探险家们也怀着感恩的心情一再指出:“心地善良的喀什噶尔人善于交往,性格欢快,爱好劳动,极有礼貌。各个阶层都认真地遵循种种礼仪形式。每个人都详尽地知悉礼仪规定,不可更改地恪守这些规矩”;“善于交往是他们的优良而美好的品德”,“晚会隆重,礼仪周全,款待极为殷情,外国人尤感疲于应付”(乔汉·瓦里汗诺夫《准噶尔概况》)。喀什百姓至今仍是“衣冠简朴古风存”;无论是探险家还是旅游经商,只要是朋友,他们的热情都能让人融化。

七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论断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论断真正所要强调的,是新疆这片地方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或为中国边疆史,或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而不可能是独立于中国之外或任何外国历史的一部分。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中国在西域(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应当说是西域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政权归属的首个标志,对大一统国家意识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但由此上溯到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域(新疆)就已经在中华文明圈的范围之内,新疆的历史就已经是中国上古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只不过是对这一历史事实在政治层面上的确认。上述论断的精当、缜密与深刻性也正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西域早期历史上包括疏勒国在内的36国或55国,